

论语研探

唐明贵 刘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语研探

唐明贵 刘伟/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研探/唐明贵、刘伟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161 - 4297 - 4

I. ①论… II. ①唐…②刘… III. ①儒家②《论语》—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0651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燕生
责任校对 韩海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聊城大学学科重点建设项目经费资助

序

《论语》作为“圣人之至教，王者之大化”，而成为中华文化经典中的经典，借助于孔子“至圣先师”的历史地位，《论语》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圣经”。两汉以下，大凡识字的中国人没有不知道《论语》的，稍有文化的中国人没有不读《论语》的，大凡中国人没有不受《论语》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经过几千年的浸润、熏习、陶冶，《论语》成为中国人价值取向的根据、生活的向导。

作为“五经之鎔鑄，六艺之喉衿”的《论语》，上承五经，下启诸子，在中国文化史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论语》，我们可以了解《诗》、《书》、《礼》、《乐》等前孔子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论语》言《诗》、《书》，论《礼》、《乐》，由此后世学者可以上贯五经。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先秦学术流派，或宗师孔子，或批判孔子，却无人可以越过孔子。从“五经”的意义上说，《论语》是流而非源；但从开启诸子的意义上说，《论语》是源而非流，《论语》可谓亦流亦源。

鉴于《论语》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两千多年以来，注释、解说、发挥《论语》者多矣，由此形成了源远流长的《论语》诠释学传统。尽管如此，《论语》诠释依然不会终结，只要人类还在，也就永远不会终结。《论语》是无限敞开的意义系统，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必成一代之用。处于伟大民族复兴历程中的一代中国学人，对《论语》应做出合乎这个时代要求的理解，以成就《论语》的当代之用。年轻学者唐明贵教授、刘伟博士的《论语研探》对当代《论语》学做出了可贵的探索。

唐明贵教授是比较年轻的学者，学术素养深厚，在《论语》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其著作《论语学史》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论语》

通史”，堪称开山之作。刘伟博士思维活跃，读书勤奋，笔耕不辍，学业日渐精熟，已成为学术界的后起之秀。两人对《论语》研究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摆在我们眼前的这部作品——《论语研探》正是其长期学术探索的结果。此书有着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对《论语》的独特理解。

首先，作者对《论语》诠释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从《论语》学的角度重构了《论语》的诠释方式。作者纵横于两千多年的《论语》诠释史之间，既尽量继承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论语》智慧成果，又能深入《论语》文本本身，从思想、文学、孔门弟子、孔子形象之角度解读《论语》，探寻《论语》的新真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时下，不少解读《论语》的学者，可谓自说自话，而对《论语》诠释史则鲜有触及。即便有所涉及，也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此部著作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在对《论语》内容进行多角度解读的基础上，比较详细地梳理了《论语》学的产生、发展过程，分析了《论语》在不同时代的地位及其影响，介绍了《论语》在海外的流传。作者没有对《论语》每个章节的内容进行阐释，而是从“思想”、“文学元素”、“孔门弟子”、“孔子形象”四个方面对《论语》进行品读。诚然，作者所涉及的问题，前人与时贤也多有论述，《论语》之内容也远非这四个方面所能穷尽，但这是作者建构《论语》学的开始，而不是终结，他们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此为起点，逐步完善《论语》学系统。

其次，作者持论客观、求证严谨。谈及治学的方法，胡适曾有所谓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十字真言，这十字真言当然不是普遍真理，但对于今人治学还是有借鉴意义的。本书在大胆假设方面发挥不多，但在小心求证方面却有独到之处。在论证过程中，作者遇到有争议的地方，并没有为了论证的需要而做选择性地取舍，而是把存疑的地方一一指出，在此基础上谈出个人的看法，求证尽可能周密、细致。如在论述“孔子的生年”这一问题时，作者将司马迁、钱穆及当今学者的看法等等做了比较简洁明了的梳理，在此基础上，再提出作者的意见，这就是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

最后，资料翔实，剪裁恰当。《论语》研究的资料浩如烟海，对《论语》章句的理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以客观、平实之态度，力求引用有代表性、在前人基础上有创新性、有启发性的观点，力求做到去粗取精，古为今用。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事业是如此，学术也是如此。经典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解读中延续它的生命，《论语》在不同时代之人的解读下，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尤为可喜的是，在唐明贵教授、刘伟博士等同人的共同努力下，聊城大学将“论语学”列入校级重点学科，我认为，这是中国高校学科自信、学术自觉的见证。百余年来，在唯西学马首是瞻的历史惯性下，西方高校有的，中国高校才敢有，中国所独有而西方高校所没有的，中国高校不敢有，如延续两千多年的经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在中国大学中竟然不存在了，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我相信，经过两位学者及其团队不懈地努力，“论语学”学科一定会有良好的未来。

颜炳罡

2013 年秋

绪 言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语录。它集中反映了孔子关于政治、哲学、教育、伦理、文学、艺术和道德修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儒家学派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从东汉起《论语》就被列入儒家经典之列，地位虽在五经之下，但在统治者选拔人才的策试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及至南宋，经理学大师朱熹的倡导，与《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所作《四书集注》在宋理宗时取得了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地位超过五经。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成为科考的依据，明清两朝相沿不变。由上可见，《论语》在中国古代始终是士子们必读的典籍之一，影响了中国近两千年。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论语》在古代就流传到了海外，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的《圣经》”。

由于“孔子一生仕止久速、造次颠沛、纂修删述、盛德大业，靡一不具《论语》；及门弟子德行气质、学问造诣、浅深高下、进止得丧，靡一不具《论语》”^①，所以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人品性格与思想观点，成为后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重要文本。因此，掌握《论语》，便逐渐成为攻治“五经”的条件之一。东汉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鎔鎔，六艺之喉衿也。”^②唐薛放说：“《论语》者，六经之菁华。”^③明杨宗吾说：“六经譬则山海，《论语》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阶乎？”^④甚至有人认为，它在某些地方已经超越了“五经”，清李元度说：

①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谭贞默语，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

② 赵岐：《孟子题辞序》，《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③ 《旧唐书·薛放传》。

④ 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十一引，中华书局1998年影印版。

“《论语》所言之义理，精且粹矣。即以文论，非诸经所能及也。《易》《诗》《书》《礼》《春秋》之文，各造其极，亦各不相谋，而简括处终不及《论语》。《论语》之文，能以数语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气，如化工之肖物，各无遁形。”^①不唯如此，在朱熹看来，《论语》是治学的起点和德行事业的标准，他在《论语训蒙大义》中明确指出：“圣人之言，大中正之极，而后世之标准也。古之学者，其始即以此为学，其卒非离此以为道。穷理尽性，修身齐家，推己及人，内外一致，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亦终吾身而已。”^②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自小处而言，研习《论语》可以修身齐家；自大处而言，研习《论语》则可以治国平天下。其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因此，《论语》一书，在中国古代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并且“百姓日用而不知”，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和信仰，是有关中国文化的某种“心魂”所在。它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也在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形成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言，“儒学（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重大作用。不但自汉至清的两千年的专制王朝以它作为做官求仕的入学初阶或必修课本，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言行思想的根本基础，而且通过各种阶层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编纂的《孝经》《急就章》（少数词句）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以及各种‘功过格’等等，当然更包括各种‘家规’‘族训’‘乡约’‘里范’等等法规、条例，使儒学（又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书）的好些基本观念在不同层次的理解和解释下，成了整个社会言行、公私生活、思想意识的指引规范。不管识字不识字，不管是皇帝宰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论语》这本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规则’、主张、思想，已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来的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语、活动中了。所以，它不仅是‘精英文化’‘大传统’，同时也与‘民俗文化’

① 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八《读〈论语〉三》，清光绪四年刻本。

②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四部丛刊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小传统’紧密相联，并造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点：精英文化与民俗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通过儒学教义，经常相互渗透、联系。尽管其间有差异、距离甚至对立，但并不是巨大鸿沟。”^①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论语》全部是精华，其中也不乏带有时代烙印的糟粕。不过“《论语》的糟粕与它保守反动的东西决不应是物理量上的相匹，这不仅因为它的释义在封建体制下、在孔子至圣先师地位之下，被累积式地、自然与非自然地曲解了很多，挺扭了不少，对它还原的过程，是去‘精’还‘粗’的过程；更主要是因为，它主旨的反动性对于后世和今天而言，与对于当时社会背景下，特定的功用初衷而言，不是等侔齐侔、一言可概的。它保守中的进步或原发性的开明、进取中的曳娄或幽旨的固守，相对于参定物是立体的、活于当时而尘影于今的；它就人的本性、人际基律的发现、认识，以及人格精神的开发，则基本上是绝对的、恒常不易的。这两者间，即使再简断，也不能说是互依、同向和俱然的关系”。对于孔子的学说，只有我们除掉有色眼镜，“才能愈见其中恒绵的价值和益于我们思智的东西，也才能愈深入准确了解当时的社会情状和我们文明的兴化历程”^②。

由于不同时代的人都研习《论语》，所以一部《论语》诠释史，以及诠释之间的微妙变化，恰好反映了中国思想、政治变迁史的一个侧面。这里把《论语》诠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嬗变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予以论述：

第一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汉时期。孔子生前，弟子从游，各记所闻，这可以从《论语》中“子张书诸绅”的记载得知。孔子逝世后，微言已绝。弟子恐分离以后，各生异见，而圣言永灭，故在给孔子守丧期间，他们便将自己所记所闻汇集在一起，编成了一个类似孔子文集之类的东西。由于诸弟子受业年限、思维能力等条件各有不同，将他们共同或单独地从孔子那里听到的话语，按各人的理解记述下来，其间存在若干歧异在所难免。及至子思，他又在此基础上，广搜博采，将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口耳相传的孔子话语收集起来，经过选择、分类、校勘、加工、整理，最后裁定而成《论语》、《孔子家语》等文献。这些文献被孔

① 李泽厚：《论语今读·序》，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牛泽群：《论语札记·序》，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氏家族世代相传，并通过不同方式流传到各地，形成了各自的传授系统。历经战国交争，秦皇灭学，到西汉时，据《汉志》记载仅剩下了三种，即《古论》、《齐论》、《鲁论》，文本有别，文字、章句自然也有差异。这不仅不利于《论语》的研习与传授，而且也与汉代大一统的文化政策相左。于是，《论语》一书的整理与定型便成为汉儒努力的方向，这一工作的开始也标志着《论语》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诞生。

《论语》版本的第一次整合是安昌侯张禹所为。张禹受《齐论》于庸生、王吉，后又改从《鲁论》，“遂合而考之”，“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①。此书一出立即得到了士子们的认可，当时社会上曾传言：“欲为《论》，念张文。”^②《张侯论》的问世为后来的《论语》学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及至汉末，硕儒郑玄又以《张侯论》为底本，参照《古论》撰成《论语注》，这是《论语》演化史上又一次重大的不同版本的大融合，该书的面世，标志着《论语》一书整理与定稿工作的完成。《论语郑氏注》为后世所重，至唐代一直是人们修习《论语》的主要文本。

与此同时，《论语》一书的诠释工作也全面展开。由于时间距离、历史环境造成的词义变化以及对孔子个性心理的不了解而形成的隔膜，使得汉代的人对作为先秦文献的《论语》很难释读，更不用说广泛传播了。而对于文献来说，其意义、价值、主旨和本质只有在传播活动中，通过解读者对文本的阐释才能生发出来。没有阐释实践，也就实现不了它的社会效用。这就要求后人利用当代话语对其进行释读，于是《论语》一书的文字训解工作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无代无之，乃至汗牛充栋，不可胜数。不过由于时代精神、历史背景以及解释者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地理文化、师说渊源、游学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对同一《论语》文本所做的诠释和注疏，也是特色迥异，流派纷呈。揆诸两汉时期，西汉以释讲《论语》大义为主，故多称为“说”，如《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等。而东汉以对《论语》中的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为主，故多称为“注”，如郑玄《论语注》、麻达《论语注》等。这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风格，西汉重今文经学，所以以疏通文

① 《隋书·经籍志》。

② 《汉书·张禹传》。

义为主；而东汉重古文经学，所以以名物训诂为主。

第二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这一时期佛教东传，道教发端，玄学兴盛，儒家经学受到严峻挑战，但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儒学在政治原则、伦理规范、社会教育上的宗主地位并没有动摇，所以《论语》学的研究并没有因此而衰落。相反，由于儒家学者构建儒学新体系的努力、文字学的兴盛以及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论语》学却获得了相当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研究《论语》的专著大增。据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统计共有102部，比形成时期的43部，在数量上多出1倍多。其中出现了两本对后世《论语》研究有重大影响的专著：一本是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该书不专一说，兼采众家，吸收并发挥了汉末采会同异、以简驭繁、力求博通的解经优点，从而大量保留了汉人解经的痕迹和特色，对于后人在汉代经师《论语》注释史料基本亡佚的情况下，了解和研究汉时《论语》学乃至经学特色是极为珍贵的；一本是皇侃的《论语义疏》，该书以《论语集解》为底本，兼采东晋江熙《论语集解》所录郭象、李充、范宁等十三家之说以及其他“通儒解释”，会通儒玄，出入儒佛，引证广博，穷明原委，是一部集六朝《论语》学之大成的著作，对于研究义疏体著作有重要意义。（二）《论语》的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不仅出现了专门给《论语》注音的《论语音》、专门疏解《论语》文句的《论语君子无所争》，而且出现了专门向郑玄发难的《论语难郑》、修正郑玄错误的《王氏修郑错》；不仅出现了援道解《论》之作，如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和《论语隐》，而且出现了援佛解《论》之作，如释僧智的《论语略解》、应琛的《论语藏集解》。（三）《论语》注解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上文，我们可知两汉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主要以“说”、“注”为主。及至魏晋时期，人们对《论语》的疏解体例发生了变化，主要以“集解”为主，如何晏等《集解论语》、卫瓘《集注论语》、崔豹《论语集义》、孙绰《集解论语》、江熙《集解论语》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征引旧说，择善而从，有不安处，兼下己意。而到了南北朝时期，《论语》的疏解体例又发生了变化，主要以“义疏”为主，如褚仲都《论语义疏》、皇侃《论语义疏》、刘炫《论语述义》、徐孝克《论语讲疏文句义》、张冲《论语义疏》等，这种体例的特点是：会通经典义理，加以阐释发挥；广搜群书补充旧注，穷明原委；逐字逐句疏解经

注文，原则上“疏不破注”。

第三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统治者不仅希望拥有政治上的统一，而且希望统一学术，遂炮制出了《五经正义》，用政府钦定的话语代替了个人的解释，垄断了经典话语的解释权，在学术上为学者们划定了边界。并且借助于科考建立了世俗利益与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经典知识话语的联系，士子们只求仕途通达，以熟读《五经正义》而自足，不再务求新说。因此，隋唐时期虽然在文治武功方面位列中国传统社会之首，但在经学研究尤其是在《论语》学研究方面却建树寥寥，相对其他时期来说要衰落得多。这表现在：（一）论著数量少。据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计有18部，比形成期还要少15部，更不用说魏晋南北朝了。（二）《论语》研究乏善可陈。值得称道的仅有陆德明的《论语音义》和韩愈、李翱的《论语笔解》，前者虽从音义两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进行了总结，但治《论》方法没有跳出汉儒的窠臼；后者虽有纠绳汉儒之功，但其疑经改注的做法也颇为后人诟病。

第四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作为传统政治的合法性依据的儒学也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形势呼唤新理论的诞生，而鉴于中国特殊的国情，这必须通过创造性解释来完成。因此，许多硕儒名士纷纷著书立说，希冀通过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解释，来重建儒学的合法性依据之地位。于是有“四书”及其注释书的出笼，有《论语》及其注释书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一）论著数量大增。据王鹏凯《历代论语著述综录》计有714部，比发展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数量上多出了6倍。其中产生了《论语》学史上两部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一部是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该书是在刊定皇侃《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其中增加了一些对《论语》内容的义理性论说和解释。这实际上开启了宋代儒者以义理解经特别是以义理解《论语》的先河，此后，许多学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便走上了义理化的道路；一部是朱熹的《论语集注》，该书在吸取汉魏古注的基础上，又集宋人释《论》之说，兼下己意，并存疑说，融注音、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而以义理见长，是继何晏《论语集解》、邢昺《论语注疏》之后《论语》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此书一出，备受后世统治者青睐，甚至被定为科考的基本内容，成为各级学校的

必学教材。(二)《论语》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论语》的注解方式,一方面注重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义理的解读和阐发,《论语》学由此而进入宋学(理学)时期。这是因为宋明学者对于经书的注释不仅仅是为了以今释古、扫除阅读理解上的障碍,而且他们欲以注释经书为手段,借以阐发新儒学,即由训诂以通义理。因此,尽管其注释中也重视文字训诂,但其目的不是为了释读而作,而是为了通经明道而作,为重建政治的合法性依据而作。

第五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清朝。有清一代特别是清中前期,由于实学的兴起和文字狱的兴盛,考据学大兴,重考证成为清代《论语》学的重要特点。由此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的新成果。(一)与《论语》有关的辑佚之作大量涌现。有清一代,《论语》古本、古注的辑佚之作层出不穷,惠栋、丁杰、王谟、袁钧、孔广林、宋翔凤、马国翰、黄奭、王仁俊等人先后来做这项工作,其中以《论语郑氏注》的辑本最多,以马国翰的功劳最大,他一人就辑了40种66卷。这些古本、古注以汉魏六朝为主,为后人研究那段《论语》学史乃至经学史提供了方便。(二)有关《论语》的校勘考异之作不断出现。如翟颋的《四书考异》(其中《论语考异》二十卷)、冯登府的《论语异文考证》、阮元的《论语校勘记》、叶德辉的《日本天文本论语校勘记》等。这些校勘考异之作,多为作者多年研究之结晶,创获颇多。(三)辨伪之作陆续问世。辨伪之作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个是孔安国《古文论语注》。陈鱣在其《论语古训》中认为,孔注《古论》据何晏叙“世既不传”,《集解》所采多不类,且与《说文解字》所称《论语》古文不合,反不如包咸《论语章句》之古,疑为后人假托。接着沈涛又在此基础上,以《汉志》于《古论》下不云有孔氏说若干篇等为据力证其为伪书,断言孔注出于何晏之伪托;而丁晏《论语孔注证伪》则从汉儒无人提及、不讳汉高祖名、安国早卒及《孔注》与《书传》、《家语》、《孔丛》说多相似,而断言为王肃所伪托;崔适《论语足征记》从《鲁》、《古》异读,率《鲁》用假字,而《古》用本字为据,断言《古论》显然后出于《鲁论》,实为刘歆伪造,托之安国所传,并为作注以证之。一个是今本《论语》的真伪问题。清代乾嘉年间,袁枚、赵翼、崔东壁三人,相继对《论语》的真实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前两人只是提及而已,而后者则用力甚勤,写下了《洙泗考信录》、《论语余说》

等专著，认为《论语》后五篇中，除“子张”篇外，“季氏”、“阳货”、“微子”、“尧曰”四篇，可疑处甚多。而前十五篇中亦间有一二章不类者。（四）《论语正义》面世。入清之后，虽然清政府大力提倡理学，但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深深地体会到了王学之空谈误国，所以对它很反感，继而引发了对整个宋明时期学术风尚的反感，他们遥承两汉学术旨趣，遂成乾嘉汉学，由此也引发了学界的汉宋之争，此争论主要围绕朱熹的《论语集注》展开。汉学家批评、驳正朱熹的《论语集注》，产生了诸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李塨《论语传注》等著作，而尊宋学者则维护《论语集注》，产生了诸如王肇晋《论语经正录》等辅翼补证之作。刘宝楠抛弃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集前人及清代各派整理研究成果之大成，撰成《论语正义》。该书训诂、考据、校勘、义理并重，网罗众家，引证博赡，堪称清人注疏中之翘楚。

目 录

序	颜炳罡(1)
绪言	(1)
第一章 孔子小传	(1)
第一节 家世渊源	(1)
第二节 孔子生平简介	(6)
第二章 《论语》概说	(31)
第一节 《论语》书名释义	(31)
第二节 《论语》的结集及早期流传	(39)
第三节 《论语》的主要注本	(55)
第三章 《论语》中的思想	(68)
第一节 《论语》中的哲学思想	(68)
第二节 《论语》中的政治思想	(82)
第三节 《论语》中的教育思想	(89)
第四节 《论语》中的修身之道	(100)
第四章 《论语》中的孔子形象	(108)
第一节 孔子人格的品评	(108)
第二节 孔子的日常生活	(118)
第三节 孔子点评他人	(123)

第五章 《论语》中的孔门弟子	(133)
第一节 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	(134)
第二节 言语科:宰我和子贡	(144)
第三节 政事科:冉有和季路	(153)
第四节 文学科:子游和子夏	(159)
第六章 《论语》中的文学元素	(165)
第一节 《论语》的语言特点	(165)
第二节 《论语》中人物形象的塑造	(173)
第三节 《论语》中的文学思想	(178)
第四节 《论语》中的成语	(183)
第七章 《论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影响	(195)
第一节 《论语》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	(195)
第二节 《论语》与中国古代的法律	(216)
第三节 《论语》在各层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223)
第四节 《论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39)
第八章 《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	(248)
第一节 《论语》在东亚的传播	(248)
第二节 《论语》在欧美的传播	(257)